

我的同学何雷

○郝春彭（1995级汽车）

何雷，上海人，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1995级本科生，2000年本科毕业保送本系读研，2001年赴美求学，2005年在美因故去世。

何雷是我非常好的哥们儿，清华6年跟我同在一个宿舍，一直睡对床。他的英年早逝对我冲击很大，也似乎成了班里同学心头的阴影。多年来我都想写一些文字缅怀他，刚好借本科入学25年、毕业20年的这个机会，重新回忆何雷，也给大家展示一个真实的何雷。

何雷是典型的上海人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典型的上海人，就是一股趾高气扬的样子，觉得全中国最好的地方就是上海，其次是上海郊区，剩下其他地方都是乡下。何雷有着极其典型的上海人特征，我们都是他眼中的“乡乌宁”。所以刚入学的时候，大家都非常反感，特讨厌他那种“上海情结”。

有一次宿舍卧谈会，大家聊起来说清华里面竞争激烈，毕竟全国的好学生都在这里，何雷就很不屑地说：“什么，开玩笑！噢，全国的好学生都在清华呀？都在我们上海呐！”

那时候清华在上海没有考试招生，全部是保送。何雷经常说的一句就是：“如果不是保送，谁来北京啊？在上海多好啊！”我们问他为什么来清华，他会说：“哎，没法子，交大、复旦上不了呗！”

班里做通讯录，他看见我写家庭电话

号码，很诧异地问我：“哎，你们家那种小地方，电话号码也有7位数啊？”

那时候，班里很多人都有一种想揍他的冲动。我也总是找各种各样的机会怼他，跟他抬杠。总之，就是想打压他那种“大上海”的嚣张气焰。

当然，作为上海人，他也确实比我们小地方来的同学眼界更开阔，见识更深刻，看问题有更多角度。和很多学生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不同，何雷刚上大学就已经展示出他对经济、社会的概念和认识了。譬如读《水浒传》，我还只停留在对比武力值的阶段，何雷却可以从经济角度对书里情节做出讨论。

不过，大城市的人也会对乡村事物感到新鲜。那时候的清华大学只能算是城乡结合部，经常能看到一些家禽家畜。有一次何雷看见活猪，就在那里大呼小叫，因为他是真的第一次见到活的猪。还有一次见到马，何雷居然上去就摸马肚子，吓得我们赶紧把他拉开，生怕马惊到一蹶子把他尥废了。

何雷嘴损心善

何雷人善良，但是嘴特别损。刚上大一的时候，经常有学生来回串宿舍卖一些衣物和日用品。有一次人家卖方还没出宿舍门，何雷就说其中一个女生“长得跟魔鬼似的”。结果人家女生听见了，带着几个男伴回来找何雷要个说法。其实那女生长得可以，就是何雷嘴毒而已，害得我们

□ 怀念师友

几个跟人道歉才平息过去。

但除了嘴损以外，何雷从不愿做什么伤害别人的事，而且但凡宿舍有什么事情需要出钱出力，何雷从不肯落后。大家有什么事，他也总愿意出主意、想办法。所以虽然刚入学时大家不喜欢他，但慢慢地大家都觉得他人不错，挺仗义，都成了好朋友。

2003年“非典”时期，国内只有3M的N95口罩能够防护SARS病毒。但那时候N95口罩还是很高端的产品，国内产能也不大，刚传出来能防毒就立刻脱销了。何雷问都没问我，就立刻在美国给我和Motte买了100个3M口罩寄了回来，让我非常感动。

在家庭中，何雷无疑是顶梁柱。他的妻子毕业后去美国普渡大学读博，跟导师和同学相处关系不好，天天在电话里跟何雷哭闹，说美国那边的人欺负她，要何雷过去陪她。最后何雷被逼得没办法，硕士才读了不到一半，向学校交了违约金退学。因为来不及申请学校，所以只能先以陪读的身份签证赴美，再申请学校和奖学金。何雷做出中断硕士学习、赴美陪妻的决定，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魄力的，也充分体现出丈夫的担当。我虽然觉得他做得不对，但从心底很是佩服他：的确够爷们！

何雷表面憨憨，实则非常聪明

何雷经常会说一些特别“雷”的话，也会做一些特别“二”的事，所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“二傻子”，但接触多了，就发现他真的很聪明。

我俩都是喜欢在宿舍里趴着不上自习的人，连机械制图都赖在床上画。我每门



本科毕业前在主楼前草坪合影。前排左起：姚承、何雷，后排左起：瞿翔洲、董献辉、李开、丛艳吉、倪春健

课只能连滚带爬地及格，何雷却都能考个不错的成绩。比如“C语言”，他一学期不去上课，我在宿舍里也没见他看过书，可他临考前随便翻翻，居然就考个98分，实在是让我汗颜。有门“机械振动”，我读起来就跟天书一般，期末考卷答得一塌糊涂，估计老师一定是对考分开方乘10了，不然我不可能及格，但是何雷还是考前翻翻，就能80多分。

何雷爱好哲学，没事儿就抱着一本哲学书籍读得津津有味。他特别喜欢康德、叔本华、尼采等，没事儿就跟我们拿出一条某位大师的观点来品评。对当时的我来说，这些人都是云雾里的存在，跟现实并不相关，也不觉得读他们的书有什么用，所以每次我都会硬怼他。

何雷看事情也比较独到，很多想法跟那时候的我们都不一样。20世纪90年代，计算机还是个新鲜玩意，编程听起来很高大上，很多同学都把学习编程作为人生的必备技能，要为毕业找个好工作增加砝码。但何雷对编程很是不屑，说其实在产业结构上，编程跟我们机械领域的车工钳

工是一样的，都是应用层的工作。我们只要大致明白其中的逻辑和套路就行了，写算法的才是核心、大牛。那时候还不太理解，但过段时间就觉得何雷说的确实有道理。

何雷退学到了美国，很快就申请到了普渡大学的博士入学资格和奖学金。随后的博士攻读也比较顺利，凭他的头脑，能够轻松应对新的学习和科研工作。

何雷的商业头脑也很灵光，在美国留学生中属于经济上比较滋润的。那时候电脑和配件产品的产能不像现在这么大、迭代这么迅速，经常会有价格涨跌。何雷总能准确判断出这些商品的价格走势，在低价时机吃入一批电脑或者主板、显卡，涨价时候再卖出去，一年下来竟然能有三四万美元的净收益！再加上他们夫妻俩学费全免，每人每年还都有一万七八千美元奖学金，算下来竟能达到七八万美元的年收入。在2003年前后，这算得上是很大一笔数字了，所以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算是比较富足，经常开车去野游、钓鱼，拍了照片发给我们，让我们在国内羡慕嫉妒恨。

何雷的死让全家都绝望

世事无常，好的开头不一定带来美满的结局，最终何雷在美国因故去世。他父母闻知噩耗后悲痛欲绝，我和国内的几位同学去家里看望他父母时，发现他父母比我们之前看到的照片苍老了许多。我们也组织国内的同学给何雷家捐款，以表我们的心意。Charles等一众在美国的同学也在安排何雷父母赴美方面做了很多工作，帮何雷父母做好安顿，带着他们与有关部门和人员做了对接，移交何雷骨灰，清理他的遗物。

说实话，我刚刚知道消息时都不能相信自己耳朵，简直跟焦雷轰顶一样，毕竟前不久我跟何雷还在QQ上聊天。我也很难想象何雷父母面临什么样的伤痛，心里有多大的悲愤。有时候试着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们的心境，结果刚一尝试就难受得无法继续：辛辛苦苦养大的独生儿子，一路高歌杀出重围，保送清华大学，然后赴美名校读博，不耽误学业情况下又能经济独立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父母应该多么自豪，多么欣慰。而突然间灰飞烟灭，全部希望戛然而止，心头宝贝异国去世……这样的变故打击，一般人哪里承受得了？！而且他们不但要承受痛苦，还要承受未来长久的那种无可替代的失落、无法解决的孤独。我们作为何雷的同学、哥们，尽管可以多去关心照顾何雷父母，但毕竟不在身边，也不可能替代亲生儿子带来的感情慰藉。

后记

后来几年，我去看过几次何雷父母，有时也会委托上海的朋友给何雷家里帮点小忙。何雷父母已经渐渐从丧子的悲痛中走出来，逐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虽然我也知道，他们见到我的笑容之下，一定还藏着那份伤心和痛苦。也许他们一直在感慨，如果自己儿子还活着，应该跟我一起坐在他们面前谈笑风生、嘻哈打闹吧，他们也会笑眯眯坐在那里看着已经成年的孩子们，尽享天伦之乐。

我也去过两次何雷的墓地。在墓碑丛林中，对着何雷的墓碑抽一支烟，发一会儿呆，回想着大学时期的过往，感触着无情的现实。

我这个人成熟比较晚，高中时候还都

□ 怀念师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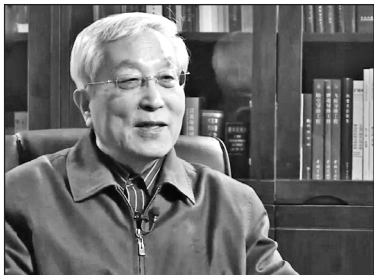
很幼稚，到了大学才慢慢形成自己的三观。应该说，朝夕相处的大学同学对我影响很大，尤其是何雷。何雷很多独特而深入的视角和观点，那些犀利刺耳而又直抵心底的语言，还有支言片语在我耳边灌输的哲学思想，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。当时我并没有感觉，可越到后来越是感触深刻。当然，何雷身上也有很多缺点和不足。但正是这些，完整地支撑起了一个有血有肉、充满真情实感的回忆。我并不相信有天堂的存在，但我也很难想象，何雷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年纪轻轻就突然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了。每次想起何雷，我总是禁不住去想，“何雷，你在天堂还好么？”

眨眼间，我们本科毕业都20年了。同学们都各奔东西，结婚生子，事业有成，也都从青涩少年变成了油腻的大叔大婶。唯一不变的，就是这种历久而弥新的同学情谊。偶尔回想起来，似乎就在昨天。

有时收拾东西，不经意翻到大学时的老物件、老照片，脑子里就会浮现何雷晃来晃去的大脑袋、让人忍俊不禁的表情、刁钻古怪的言语、颇有些无厘头的行为。有时同学聚会，也会经常怀念大家一块儿玩、一块儿闹、一块儿疯、一块儿笑、一块儿逛街、一块儿逃课的场景，还会谈起当年谁有意思的哪个女生，谁被老师训得抬不起头。

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我们虽然缅怀过去，但更要放眼未来。努力要做的，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，让自己家人和自己关心的人活得更加幸福；更好地践行自己的价值观，做对家庭、对社会、对祖国、对世界有用的人；更努力地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完成事业的目标，不虚此生一行；更重要的，还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永远保持自己当年的真诚和初心，“即便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”。

导航制导与控制专家陈定昌逝世



导航制导与控制专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研究院研究员陈定昌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20年9月7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3岁。

陈定昌，1937年1月生于上海，籍贯江苏镇江。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

系。历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、二院院长、二院科技委主任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、二院科技委顾问。200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
陈定昌长期从事高精度无人飞行器技术、高精度探测与制导技术和仿真技术研究工作，先后主持或参与多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，取得了多项国家重大工程技术成果。回顾几十年的航天生涯，他曾自谦，自己并不是思维超前，而是在考虑问题时喜欢从全局出发，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。“我一生的最大追求，就是在实现中国梦上做了一些工作。”